

# 扬帆 自述

扬帆 著



群众出版社

揚帆自來

**扬帆自述**

**扬 帆**

---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248千字 插页2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

ISBN 7-5014-0285-X/I·86 定价：4.80元

印数：0001—4100册

---

# 序

李一氓

我认识扬帆在一九三九年，那时我在新四军军部工作，军部驻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的部队，是三年游击战争分散在湘、鄂、赣、皖、闽、粤、浙、豫八省的游击队。组成新四军时，在江南的组成三个支队，在江北的组成一个支队。第一支队一九三八年由支队司令陈毅率领，挺进敌后，到达沪宁线茅山地区。一下新四军的名声就威震江南了。这就发生两种情况，一是上海地区的男女爱国青年都涌向皖南新四军，要求参加抗日；二是上海各界爱国人士，都募集各种慰劳品，如布匹、药品等，捐献给新四军。上海中共委员会，尽了最大努力，使这两项工作，得到显著成效。特别是这批青年都具有中学以上的文化水平，这样使新四军三个支队的文化素养有很大的提高。在抗日战争中、在解放战争中，以及在解放后的建设中，他们在华东地区或第三野战军都逐渐成长为党、政、军各方面的中坚干部。

一九三九年上海各界，组成一个庞大的慰问团。以慰问第三战区的名义，专程到皖南来，慰问新四军。在慰问团的党员内，上海党向军部提出，这些干部，某些同志为工作关系，必须仍然回到上海；某些同志，可以回上海，其中如军部要留下某些同志也可以；某些同志因工作环境，不能再回上海，必须留在军部工作。这样军部就在这批慰劳团中吸收了一批干部。扬帆同志，就是上海党指定的第二类，而由军部考虑留下来的。他以后就一直在新四军工作了。他开始是替新四军一个戏剧学习班讲了一个月

课。虽然他过去的学习和工作接近戏剧，但搞戏剧的人在新四军的不少。我们就说服了他，当了新四军军法处（即保卫部）的地方科长。其主要任务是了解新四军驻地周围的地方情况和联系新四军驻地周围的地方关系。保卫部隶属于军政治部，为着适合国民党的编制就用了军法处的名义。我挂名当处长，而真正的保卫部部长是汤光恢。部队保卫工作有政治部，我不管。我有时有必要过问一下地方工作，因此我跟扬帆同志有这么一层工作关系，彼此就更熟悉、更了解了。在皖南时期，由于他的努力，我们对于军部周围的地方情况比较清楚，这很有利于部队的巩固工作。他思想敏捷，反映快，工作又踏实，所以军部和政治部对他的工作都比较放手。不幸在一九四一年发生了皖南事变，由于判断错误和指挥错误，堕入国民党的奸谋。一个完整的军部和几千人的部队，被打得溃不成军，或者说被消灭了。在乱军中，我不了解扬帆的情况，我也不了解他怎么和胡立教同志会合在一起了。他两人结伴同行，冲出国民党的包围，在国民党地区和敌占区，公然徒步回到了盐城军部，而且是参加皖南事变的首先一批回到军部的两个人，时间是一九四一年二月。他是江苏常熟人，胡立教是江西人，当然扬帆就有了语言和风俗习惯的便利条件，自然利用了这一条件，路上可能遇到的一切困难就不难克服了。

我比他们回军部晚得多，大概是一九四一年五月。皖南突围以后，我经过徽州、金华、上饶、衡阳到桂林，时正是一九四一年的元宵。我本想回到重庆，向周恩来同志报告经过，但为李济深所阻，他帮忙把我送到韶关，然后乘飞机飞到香港。在香港又由潘汉年陪同前往上海，上海组织这才派一个秘密交通把我送到苏北军部。这时扬帆已任军部军法处副处长，并兼盐阜地区保安处长。我回到军部后当然无所事事。那时是吃大锅饭，军部自己没有招待所，不管住在那儿，都是老百姓的房子，都是公家发粮食，军部同意我寄住盐阜保安处，吃他们的饭，住他们的房子。

虽然住在一个单位，和扬帆也经常见面，但他有自己的工作，我是闲人。那时也找不到什么书看，就向扬帆那里拿了一本《资本论》第一卷，带着日程似的，我成天就阅读《资本论》，从第一页起，一行不漏，虔诚地看一段回味一段。大概读了三个月终竟勉强把它读完了。搞马克思主义，这可算是补了一大课了。一九四一年冬天，我参加华东局的扩大会议，一九四二年春天，被派到淮海区任地委副书记，主持政府工作。从此就和扬帆分开了。

一九四三年突然听说，军部从盐阜地区把扬帆调到淮南，关起来审查。一九四四年又说已恢复工作，没什么事情了。解放后，他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一九五五年与潘汉年同时被逮捕，说成是潘扬一案。这时我正在维也纳，猜不透是什么原因。我总怀疑，即或有什么问题，两人也无论如何联不起来。以后自顾不暇，也无从去过问这些问题了。

现群众出版社，将扬帆所作诗文，编为一集。写作时间约是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它不是正式议论抗战、解放战争和解放以后的论文，而是一些抒情的童年回忆、书信、笔记、诗词。其文字无论慷慨、幽怨、笔调一概清新。可以从侧面了解新四军在抗战中的情况，以及解放战争、解放以后的反特情况，更可以了解他本人跟这三个时期的关系，以及他在这三个时期的认识和情感。他本来可以以他的才干，特别是在解放以后，完成他做为一个革命者的任务，但是一九五四年以后到今天，已经白白地过去三十多年了，而仅仅留下这一诗文集。要追究此一时代错误，可为叹息的，又不只扬帆一人了。

一九八七年三月一日序。





扬帆

扬 帆 著

群众出版社1989年北京

本书的出版，得到上海市公安局的大力支持。



# 目 录

序	( 1 )
扬帆自述	( 1 )
童年漫忆	( 65 )
戏剧与评论	( 93 )
布袋队	( 105 )
从上海到皖南	( 133 )
皖南突围记	( 187 )
往事随笔	( 215 )
鹤唳集	( 247 )
回忆与怀念	( 289 )
后记	( 315 )

# 扬帆自述

---

---



## 一、青少年时期

我原名石蕴华，三十年代在上海做文化工作时取名殷扬，参加新四军后改名为扬帆，写文章时先后用过殷炎、殷扬、钱望等笔名。我在一九一二年出生在江苏的常熟城虞山镇。常熟是江南有名的美丽而富饶的鱼米之乡。县城有十万人口，它虽不及苏州城大，但有“十里青（虞）山半入城”的特色，城南又有一个比杭州西湖略大的尚湖，所以常熟城既有城镇的繁华，又有湖光山色兼收并蓄之美。这里也是文人荟萃之所，历史上曾出过不少有名的文人，晚清当过光绪皇帝老师、参与戊戌变法的翁同龢就是常熟人。

我家的祖先是书香门第，曾祖父石云山（禹之）是江南（恽）南田画派中有名的画家，祖父石金声是医生，又是数学家。父亲石立（冠卿）毕业于江南高等学堂，也善于吟诗，曾在中学任教。因派系磨擦，后又弃教去工厂当职员。也曾失业在家，终日喜爱喝酒，从不问家事，家庭经济就败落了。母亲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家庭妇女，家务全靠她操持，困难时靠典卖陪嫁饰物过日子。我是她四个孩子中最喜爱的唯一的男孩。我从小养成富有自信而倔强的性格，读完高小后，因无力升学，本人不愿意去商店当学徒，同族一位叔祖和父亲就在家教教我读书学诗。所以，我

十二岁就开始学诗。一九二五年我十三岁时，家里把我送到上海，依靠在上海一家银行里当职员叔父的资助，进华艺中学读书。离家时父亲还专门把《十八家诗抄》和《随园史话》等书给我带着，嘱咐我“不要荒废了学诗”。在上海我们父子有时也常对酌饮酒吟诗。我喜爱诗词和嗜酒的习惯，就是从小受父亲的影响。一九二六年，我又随叔父从上海到北平，进入育英中学。两年后，因在家乡的父母生活更加困难，母亲来信坚持不让我再读书，要我挣钱补助家用，我也不愿长期依赖叔父周济，一九二八年三月便辍学入北平大陆银行，当了三年练习生。在北平结识了一些朋友，如在育英中学认识了进步同学袁成隆（后知是共产党员，在监狱中牺牲了）和我关系较好，受他的影响也开始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在银行中发起了组织“同人进德会”，办了一个图书馆，一个俱乐部。一九三〇年的元旦，在银行举行的一次团拜聚餐会上，我喝酒多了，控制不住自己，当着总经理的面抨击了银行的剥削和黑暗，还自称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因而打破了银行的“金饭碗”。在叔父和朋友们的帮助下，进入文治中学读书。一九三二年九月又以优分第九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读中国文学。

## 二、从埋头读书到投身学生运动

我在北大文学院学习比较努力。学校规定，学生考试成绩总平均八十五分以上的可领取奖学金。我入校后，连续领取了三年（每年一百元）奖学金维持生活，同时我经常在报刊杂志上投稿发表文章，也可得到一些收入作补贴。但生活还是艰苦的，终年布衣布鞋，冬天快到了，身上还是那件蓝布长衫，晚上写文章，以烧饼充饥。后来，我和宿舍的二位穷学生杨启哲、杨雨民在一起自己做饭吃，戏称“三友合作社”。我对现实很不满，思想上很苦

闷，在独自过着贫困的生活中养成了怪癖，生活上不修边幅，那时不愿接近任何人，更不让任何人窥探我生活的秘密。在孤僻中抚摸着思想的苦闷。我企图从苦闷中打出一条路来。我在白天把房门倒锁，从房后的窗户里跳进跳出。夜晚在熄灯以后，点起蜡烛翻书本、摇笔杆，写一些诅咒社会、探索人生的散文，以殷炎的笔名在《学文月刊》上登我写的小说。《文学月刊》上登我翻译文章。我还在《文艺书刊》、《华北日报》、《大公报》等报纸上发表过作品。

我这时其实尚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主义者，我的真正转变主要得助于北大同学、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唐守愚（杨启哲）和刘江凌等同志的帮助。唐守愚同志当时是文学院史学系的学生，和我同住在北大“三斋”的学生宿舍里。开始他以地下刊物向我约稿为名来接近我，从此我对地下刊物和他借给我的进步书籍发生了兴趣，接触就多起来了。“三斋”里住了不少进步学生，学校当局认为这里是共产党员和左倾分子的大本营，千方百计想把这批学生拆散安插到其他宿舍去，便决定取消“三斋”。在发出正式通知后，遭到学生们坚决反对，我也在唐守愚的支持下成为“护斋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我曾代表和北大校长蒋梦麟谈判。经过斗争，学校当局被迫同意缓迁一年。从此我和唐守愚在政治上结合起来。我在北平“左翼作家联盟”（唐和赵宗璽是领导人）的领导下组织了“文学研究会”。当时北大学生组织的组织很多，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世界语学会”、“同乡会”、“乐友会”等等，我先后参加了十多个组织的活动。别人都认为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实际上当时我还没有入党呢！在这同时，我也积极参加了“一二·九”学生抗日运动，担任了北大学生会的执委和纠察队长，在游行示威中曾和国民党警察搏斗，从他们手中抢过水龙头来冲击警察。我还组织同学参加演剧活动，我担任导演，也当演员。还记得一九三五年北大有一位学生（当时政



治背景不明)，利用外国人的所谓预测，说：一九三六年将发生世界大战，于是发起并组织了“一九三六年(国际问题)研究会”，要同学们对一九三六年的国际形势进行讨论。我接受唐守愚同志的指示参加进去，目的是和他们辩论。他们拟了几十条所谓章程，第一条就是组织名称，我指出这个名称出自迷信洋人，点穿一九三六年预测是洋人没有根据的猜测，为什么要以此命名？当前东北三省国土沦亡，从关外到关内，日寇步步进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什么对中国的现实问题不讨论、不研究？！我和一批同学对“章程”逐条进行批驳，结果争取到这个组织有我们的人参加了领导，研究大纲也是我们制定的，拨转了讨论的方向，使原来的发起人感到失望。这个组织以后也就不了了之。这个组织的这位发起人，后来在共产党的影响下逐步转向革命成为有名的新闻记者。

有一次北大被军警严密包围，不许学生进出校门，和校外游行指挥部的联系一时也割断了。一天早晨，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坐了小汽车进校来，我主动地迎上去，对胡适说：“学生宣布罢课了，你来了也无法上课”。胡适听了当即准备返回，我乘机对他说：“我还没有吃早饭，我搭你的车出去吃早饭好吗？”胡适同意了，我便利用这个机会跑到西单一家咖啡馆，和掩护在那里的北平各大学学生会的联络点取得联系。我这时政治觉悟尚不高，有怕受组织约束的思想尚未入党，但唐守愚同志已了解我的思想倾向和为人品质，对我是信任的。有一次由于叛徒出卖，掩护在国民党关麟征部担任团长的一位党员（赵春善，河南人，黄埔军官学校毕业，中共党员、后英勇就义）被逮捕了，这个党员和另外几个党员平时都有联系，必须立即将这一情况通知他们有所准备。在这一危急情况下，唐守愚同志密托一位妇女来通知我，要我设法去通知那几个党员，记得其中一个北平卫戍司令部的一位姓俞的处长，我完成了这一使命后，为防意外，也临时出城躲

避了几天。

### 三、进入戏剧界和新闻界

一九三五年八月，我应聘到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去任职，从此开始了和戏剧界的接触。

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南京创办了这个戏剧学校，特从北京大学请了余上源教授担任校长。国民党中央党部文化运动委员会也插手进来，每月拨给二千元经费，由CC分子张道藩为校务委员会主任，凌驾于校长之上。因为缺乏人才，他们不得不延聘当时有名的左倾的戏剧家马彦祥、曹禺、应云卫（任教务处主任）、吴祖光、黄佐临、许幸之等担任教授，甚至还请了田汉、阳翰笙等为特约讲师。校长余上沅在北大文学院教书时，又是北平小剧院负责人，我是小剧院基本会员，因我参加戏剧活动，经常和他接触，余对我即甚赏识，一九三五年八月，他去南京就任时，便约我去南京该校工作。当时，我在北大还有两学期才毕业，我有些犹豫。经征求地下党同志的同意，才于一九三五年的暑假期间先去了。担任了该校总务主任和训导委员会秘书，训导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我负责。去了几个月，在一九三五年冬，北大学生会主席朱仲龙和常委杨雨民、王拾风等因北大学生会工作的需要，要我回校参加学生运动。他们都是我的知己朋友，我便决定请假仍回北大继续读书。回校后，因学生会已遭解散，北大中共党支部书记刘文卓同志要我去“新兴语文联盟”，任“新联”委员，又担任了北大（四年级）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区队长。在北大新的学生会成立时，我又任常委。一九三六年七月正式毕业后，我才又到南京戏剧学校继续原来的工作，并兼课。唐守愚同志曾来南京看过我。

这个学校就是解放后中央戏剧学院的前身，现在戏剧界许多

同志肯定了他的历史地位，被认为是“我国第一所话剧专业学校，它办学时间长，培养人才多，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为中国戏剧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个学校历届的毕业生后来不少均参加了进步的戏剧活动，或去了延安，今天仍有不少是戏剧界的导演、演员或文艺工作领导干部。记得当时的学生第一届的有凌颂强（子风）、叶子（仲寅）、何德璋（何兆铃）胡子、严恭、况群等；第二届的有：王大化、项堃（王象坤）、赵鸿模（牧虹）、凌瑄如、张逸生、骆文宏（骆文）等。

一九三五年，全国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南京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所在地，统治较严，群众的救亡运动受到压制。我在戏校学生中的活动，开始时是通过两个学生。一是唐守愚的同乡李镇园；另一位是女学生吴光伟，在北平时也是经唐守愚同志介绍认识的，她的丈夫张砚田是个党员音乐家，所以我们都了解彼此的思想，她与另一个女学生杨雨辰常到经济学家孙晓村家里去。我经吴光伟介绍也认识了孙晓村，孙又介绍我认识了经济学家千家驹。我在南京没有什么朋友，与孙、千二位来往很密，无话不谈。一九三六年秋，孙、千和我共同商量组织南京各界救国会。经联系准备后，第一次开会是在玄武湖游船上。参加会议的有孙晓村、千家驹、曹孟君、陈洪进、狄超白和我等人。会上决定成立南京各界救国会，确定由孙晓邨、曹孟君主要负责，并由他们和上海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保持联系。组织部长由千家驹、狄超白担任，我任训练部长，曹孟君还负责领导妇女界救国会。以后党曾派唐守愚同志从上海来南京，以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名义来指导过工作。当时斗争环境很艰苦，只能采用秘密方式，而不能本身名义公开活动，曾经用“绥远抗日后援会”的名义进行活动。但是，当时国民党上层中的冯玉祥、李德全以及张继、梁寒操（国民党中孙科派的骨干）等与南京救国会的活动均